

空间理论视角下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结构困境与治理逻辑

——以 G 省 S 社区为个案

付钊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以 G 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S 社区为个案, 基于空间理论构建“空间分异-空间解构-空间区隔-空间赋能”的分析框架, 探究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空间变迁导致的结构困境及治理逻辑。研究发现: 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异, 使其原有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解构, 并催生新的空间区隔, 使空间结构从血缘熟悉体到地缘陌生体转变, 制约着安置社区共同体秩序的形成; 应通过空间结构-空间关系-空间实践-空间发展的多重空间赋能逻辑, 挖掘、整合和激活居民空间场域中的潜在动力, 赋予空间流变基础上生产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内在能量, 化解易地安置社区共同体障碍并助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

关键词: 易地搬迁; 空间解构; 空间区隔; 空间赋能; 治理逻辑; 社区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3)02-0049-09

Structural dilemma and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relocated and resettled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eory: A case study of S community in G province

FU Zhao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Sociolog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S commun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in G Province as a case,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spatial deconstruction-spatial segmentation-spatial empowerment"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space theory to explore the spatial change process and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commun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relocated and resettled community deconstructs the original physical, social, spiritual and governance space, and spawns new spatial divisions, transform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from blood familiarity to geographical stranger, and restric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ty order in the resettlement community. It is advisable to explore, integrate and activate the potential power of residents' spatial field through the multiple spatial empowerment logic of spatial structure - spatial relationship - spatial practice - spatial development, endow the physical, social, spiritual and governance space internal energy produced on the basis of spatial rheology, and resolve the obstacles of resettlement community and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mmunity.

Keyword: relocation; spatial deconstruction; space segmentation; space empowerment; governance logic; community

一、问题的提出

易地扶贫搬迁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脆弱地区、偏远山区和民族地区群众脱贫发展的重要举措。易地扶贫搬迁是人口居住在空间场域的转移, 实质上是与传统乡土生活的隔断, 居民呈现原子式分散状态。传统基于血缘、地缘和宗族联结下的产业结构、文化传承、社会交往逐渐嵌入一个陌生、复杂和激烈的社会场域, 安置区的居民由于生产结构、关系结构、组织结构、

收稿日期: 2023-01-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1BSH063)

作者简介: 付钊(1995—), 男, 甘肃灵台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工作。

文化结构的差异呈现出社区信任、社区支持、社区认同、社区归属和社区治理的离散碎片化状态。由于缺乏提供应有支持与资源的驱动力,安置社区内部治理效能低下和外部治理能力不足,严重制约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对基层社区治理创新和实现共同富裕带来负面影响。

学界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其一是推动安置区群体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从生计方式、文化心理和身份认同三方面促进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融入^[1],整合农户生计方式,重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新型集体意识,促进多民族融合^[2];其二是关注混合性安置社区的治理问题,推动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空间重构^[3],基于居民需求端重构生活共同体和治理端重构社区治理共同体^[4],回应易地扶贫安置社区各阶段的需求实现元治理^[5],发展新型农民集体经济,推动农民组织化建设,发挥民族文化的整合能力,促进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的重建^[6];其三是注重多民族安置区少数民族群体的能力提升,从生计属性的内在联系寻找搬迁农户的可持续发展路径^[7,8],以适应现代社区发展;其四是关注易地搬迁社区的治理困境与治理共同体建构,鉴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内部存在碎片化问题,应通过公共文化设施修建、文化资源下乡等重构社区文化共同体^[9,10],通过多维空间形塑与协调构建移民社区共同体^[11]。

综合而言,目前研究多关注安置区居民的社会融入和生计能力提升,或在同一民族(单一民族)安置区构建文化和社区共同体,而目前易地搬迁安置区居民民族背景迥异、文化成分多元、生产社会结构复杂,其社会治理不容忽视。为此,笔者拟基于空间理论,以G省S社区为例,探究易地搬迁安置居民的空间变迁,分析瓦解社区共识和参与机制的空间分异与空间区隔的结构困境,并借用空间赋能破解社区共同体构建障碍,以重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现代社区治理共同体。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空间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生活的新视角,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被广泛拓展与运用。马克思最早关注“空间”并指出空间是人类生产活动所需的基本要素^[12],资本主义在资本的推动下改造、重组和占领空间,并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空间的分裂^[13,14]。尽管马克思

对“空间”的理解更侧重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其强调空间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15],为后续空间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视角。20世纪70年代以后,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系统阐述了空间概念,他认为空间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产生、解构和转化,空间不是单纯的社会关系演变平台,而是一个发生于社会生活中的由人的活动在客观现实中建构起来的关系性存在^[15],并基于此分析了物理(感知空间)、精神(理念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三种空间。布迪厄在解释空间建构时认为人们由于所持有的资本结构和量的不同而被划分到不同社会空间,行动者基于其地理空间、资本和惯习进行不同的集体建构,由此产生区隔空间^[16],不同场域的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生产出社会区隔^[17]。社会学领域所关注的空间隔离和分化,并非以空间为其归宿,而是以阶层为其归宿^[18],如西方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的维度为种族、职业和阶层^[19,20]。可见,空间逐渐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并被赋予深刻的内涵,尽管有学者指出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的传统关系受到阻隔甚至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但无论如何,空间性分析依旧是社会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21]。

我国在现代化探索过程中以独特的方式融合城乡空间结构,多重权利博弈不断塑造新的城乡形态,易地搬迁不可避免带来传统社区空间破裂及新型城市空间的重构。结合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本研究建构了“空间分异-空间解构-空间区隔-空间赋能”的分析框架,从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物理、社会和精神空间层面,探讨其空间结构的变迁过程、现实表征、结构困境及治理策略,具体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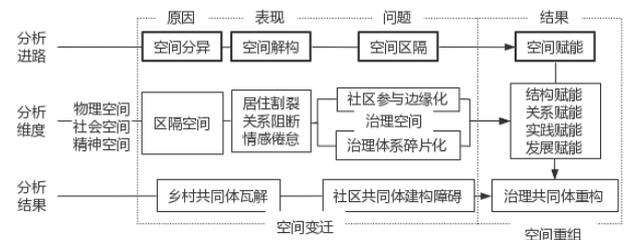


图1 “空间分异-空间解构-空间区隔-空间赋能”分析框架

L区是G省承接省内生态脆弱地区、贫困地区及受灾地区群众灾后重建安置的主要承接地,S社区是L区生态移民搬迁安置的典型混合社区。截至2022年,S社区安置省内11个市县36个乡镇的1062

户 4 163 名受灾群众,面积 1.5 万平方米。社区居民背景较为复杂,其民族成分包括汉族、回族、藏族、土族、裕固族、哈萨克族等,有个体工商户、农民、企事业单位职工、自由职业者、农民工等;社区内有 3 所小学,2 所幼儿园,以及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中心、文化站、日间照料中心等公共资源。S 社区处于西北边疆多民族融合地区,是脱贫攻坚和扶贫安置工作的典型示范区。对该案例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多元民族融合,构筑基层治理的样板,对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空间再生产的演进特征:从血缘熟悉体到地缘陌生体

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空间生产演变遵循空间分异-空间解构-空间区隔的逻辑过程,空间分异(居住隔离)作为空间变迁的先决条件,直接促使空间解构及区隔空间的产生,空间解构及区隔空间又催生着新型的空间区隔,进而诱发治理空间的结构障碍。S 社区空间变迁的基础逻辑是易地搬迁带来社区空间分异,并促使空间解构和空间区隔;空间变迁的表征是空间解构映射的新型空间区隔及空间发展调适问题;空间变迁的结果是由于空间解构催生新的社会隔离与社会歧视,使得安置居民由于群体、话语、人际和心理隔离等在社区参与中逐渐边缘化,致使社区治理体系碎片化,瓦解了社区固有的治理秩序和治理格局。

(一) 空间生产的基础逻辑:空间分异催生空间解构和区隔空间

空间分异是空间解构的先决条件。“分异”是由一到多、简单到复杂、同类到异类的过程,核心是强调社会各群体间距离的变化^[22],西蒙森指出,“空间并非社会的物质环境,其差异性会影响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活”^[23]。空间区位是社会的坐标及个人隶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身份标志^[24],伴随空间分异使得肤色、户籍、民族、职业、收入、教育等不同的特定人群在物理空间上的类别化。传统物理空间分异基于国家政策战略、生产生活方式、地理区位选址等在城市和农村社区表现出二元结构的分异特征,同一空间内的群体在人口结构、资源存量、生活方式和教育水平等维度同质性较高,这种城市

空间分异状态伴随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商品化被打破,使得空间分异现象不仅仅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单一维度。现在的城市社区形态依据其产权形态和空间形式可以划分为商品房小区、廉租房、拆迁安置房等等^[25]。易地搬迁使得外来人口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与原住宅区居民隔离。S 社区由东西两个区域组成,西区居住空间按照不同身份属性、权利结构和资源占有被划分为传统街区、商品房小区、廉租房小区以及搬迁安置区四部分。传统街区多为本地居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建设(2008 年),商品房和廉租房小区由当地社区规划和出资建设并由周边城市流动人口租赁和购置(2012 年),搬迁安置区由政府统一规划和调配出资建设用来承载省内的生态和扶贫移民(2021 年)。其中传统街区 3 居室是 100~120 m²,房价约为 1.3 万/m²,搬迁安置区 3 居室为 70~90 m²,房价约为 0.56 万/m²;传统街区周围有文化广场、绿化园、公共卫生间等公共设施,搬迁安置区则只有一个公共垃圾处理集装箱;传统街区周边有社区综合办事大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机构、幼儿园等文化服务组织,靠近南北门和交通站点,明显更有优势。因此,受到搬迁安置区居民户籍管理、身份属性和福利保障政策的影响,S 社区在住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区隔空间,安置群体居住空间与本地居民隔离,物理空间呈现“分化”和“碎化”特征^[26],区隔空间与空间歧视得以产生(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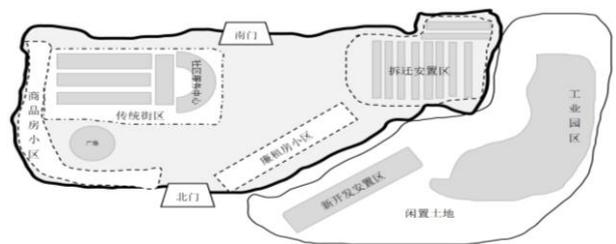


图 2 S 社区西区住宅空间草图(部分)

(二) 空间生产的现实表征:空间解构映射新型空间区隔及空间发展调适

空间区隔是空间解构的隐性表达。作为空间变迁下的扶贫和生态实践,易地扶贫搬迁使迁出地与传统空间的共同联结断裂而嵌入一个全新的空间形态。空间解构及区隔空间生产出新的物理、社会和精神区隔,表现在物理空间生产中的公共载体不适、社会空间生产中的社会交往疏离、精神空间生产中的社区认同障碍等,而居住割裂、关系阻断和

情感倦怠等新型空间区隔又影响空间发展调适。

1. 物理区隔与居住割裂：物理空间生产中的公共载体不适

易地搬迁是将多个分散的乡村集体统一安置在集中的物理空间，而物理空间转换是搬迁过程最直观和实际的感知。乡村公共物理空间包括祠堂、庙宇、水井、广场等物质形态和民俗节庆、婚丧嫁娶等非物质形态，是乡村进行生产生活的实体场域和情感寄托的载体。传统基于血缘和地缘构建的乡土物理空间包容度很高，而安置区新的物理空间受到工业化和商业化洗礼更多呈现出资本和私人属性。S社区作为典型混合型安置社区，地域属性兼具城乡结合二元形态，社区内部居民结构及背景复杂，多元民族交汇、多元贫困人群和多元生计方式的“三多”结构使其显著区别于传统社区，其物理空间解构、居民“集体上楼”引发各类适应问题。一是生活设施不适应。乡村物理空间更多强调空间设施和资源公共性，新型的重构空间是政府在资源整合基础上的整体规划和调配，强调的是私有空间和公共空间交叉使用，具有封闭性和复杂性，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感受到的是“空间狭小、使用复杂、不自由”，普遍表示，“不习惯使用马桶和天然气、厨房和储物空间狭小、电梯耗时拥挤、门禁导致交往受限”。二是生产生计不适应。新型空间难以提供多元化的物质生产资料 and 基础，一部分居民只能转变生产方式放弃原有土地而选择进城务工，另一部分居民无奈推行“生产和生活分离”，即生活在城市社区，保留农村的土地生产，这两种形式都会因为劳动力流失而使社区空心化。如居民表示，“搬迁前以为可以不种地在社区附近打工，来以后发现附近没上班的地方，回家种地又太远，老公只能去送外卖挣零钱”（G居民）；“以前家里吃的东西可以种，只需交水电费，农村水电都便宜，现在社区要买吃的，物业费、管理费等等一大堆，每个月开销太大了”（H居民）。三是文化载体不适应。文化载体是人们进行情感交流、信仰寄托和价值生产的实体场域，文化异质性赋予各群体不同的文化表达和承载方式，例如汉族的扫墓祭祖、回族/东乡族的清真寺、藏族的转经和风马旗、裕固族居住的帐篷等，安置居民与原寄托情感和信仰习惯载体的远离及新型空间中相应载体的缺失，导致安置居民难以有效进行情感交流和信仰寄托。如居民表示，“回族有个传统，每周都做礼拜，以

前在村里去寺里面，现在只能在家里面做，有时候邻居还去保安那边告状说害怕”（D居民）。

2. 社会区隔与关系阻断：社会空间生产中的社会交往疏离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弥漫社会关系，空间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27]，社会空间本质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形态，是主体属性构成和主体行动重构形成的空间结构，人的社会化过程正是在社会空间运作的^[28-30]。齐美尔指出，“小群体内部人际交流更为直接和亲密，群体凝聚力强，群体规模增加，异质性增强，群体协调性降低”^[31]。易地搬迁将多元属性的区域群体集中划分子统一的地域范畴，差异性的人口结构和多元性的文化背景使得重构的社会空间丧失了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情感维系纽带，成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障碍。S社区由G省11个市县36个乡镇的不同区域性群体聚合而成，社区内部异质性巨大，居民在收入、财富、教育、医疗等资源上占有不均，具有民族、语言、宗教、职业和习俗上的多样性，以及部分少数民族群体的饮食、风俗和信仰的独特性，催生着类别化和特殊化的社会交往形式。类别化社会交往隐含的是安置居民会自主选择与其同质性较高的少数群体互动，表现在很少与其他邻居（原生或其他安置居民）交流或娱乐，导致安置居民缺少应有的社会支持，如居民表示，“人家和我们也不认识，我们也不怎么交往，我主要是和之前我们村的一些人平时聊聊天”（C居民）。而特殊化社会交往则是由于社会交往类别化导致缺少应有的社会支持，安置居民的社会交往逐渐转向初级关系网络，主要表现在与安置社区外亲友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如居民表示，“这个也没什么办法，平时不干活的时候我就去找一下其他的朋友，或者给我亲戚什么的打个电话说会话”（A居民）。类别化和特殊化的社会交往形式共同缩减了社区整体的关系网络，疏离低效的社会关系代替了亲密高效的社会关系，影响社区人际互动关系、信息资源的获取和传播、社会群体（组织）的形成，致使社区人际关系疏离，弱化了社区社会资本，新陌生人社区由此产生。

3. 精神区隔与情感倦怠：精神空间生产中的社区认同障碍

精神空间作为一种情感性的主观体验，是物理和社会空间在心理层面的拓展，是情感和意识对外

部世界染色、过滤和编辑后构建的空间^[32]，是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心理活动的实践场域，包含着人们的身份认同、情感体验和心理活动^[33]。就社区共同体而言，精神空间包含个体心理空间和群体心理空间两个维度，个体心理空间更多强调个体的情感归属和心理体验，群体心理空间则是个体在日常实践中受到社会关系网络中各种信息的熏陶并在这种关系网络中形成绝对与相对、抽象与具体、共享与独享、主导与从属的空间形式^[34]。从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的文化堕距概念出发，易地搬迁新型社区空间变迁中物理和社会空间生产先于精神空间，即先是物理空间景观在感知上发生直观变迁，其次是社会空间中社会交互网络缩减，最后才是精神空间中心理体验的建立。S 社区搬迁居民嵌入新型的社区空间后，物理空间不适应和社会空间交往疏离使其情感体验和心理记忆存在较大冲突与差异。一是居民搬迁带来主体性的缺失。一方面，传统乡村中土地和房屋被视为私有财产，有土地就有了资本，私有资本奠定了村民在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而城市社区更强调公共性，所购置房屋仅有使用权且需缴纳物业费，搬迁居民因失去赖以生存的私有财产而在社区缺乏主体性；另一方面，城市社区管理多将搬迁居民排除在社区治理场域之外，其权益很少被配套设置并予以保障，使得其面临权利掌控困境而出现主体性缺失。正如居民表示，“啥社区的主人，要地没地、要钱没钱，就在这过一天算一天，人家那些城里的婆娘跳个舞，我也想去人家都不要，以前村里开会还有人叫，现在半年了没见过居委会”（F 居民）。二是身份认同障碍衍生的自卑感。搬迁居民兼具“农民”和“市民”双重属性，生活方式上初具“市民”的特征，而惯习和生产方式上仍兼具浓厚的“农民”特征，身份双重空间错位使得居民难以产生相应身份归属感而表现出自卑感。正如居民所说，“啥城里人，连工作都没有，以前土里扒食，现在就老老实实住在城里”（I 居民）；“人家城里有工作，我们没工作，土地也没了，也没有钱，也不知道是不是农民”（R 居民）。三是社会交往疏离引发的情感对接困境。一方面，乡村社会中村民赖以进行情感交流的物理空间载体和初级社会关系网络解构，而城市社区中的物理空间设施有限性、资源排他性和网络空间性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破碎使得村民情感交流空间和对应的关系网络出现错位和空缺。正如居民所说，“要

是娃娃同意，我和老婆子肯定都回去了，娃娃一天也不在，路上老小都抱个手机玩不够，下去转一圈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看啥都不熟悉都不踏实”（A 居民）；“有疫情还没回去，给先人烧纸都没地方，去外面路上烧当官的说污染环境”（I 居民）。四是生活水平差异引发的相对剥夺感。传统乡村社会同质性较强，而安置区因汇集多元背景的群体其居民具有异质性，搬迁居民在生活实践中与其他群体比较后易生发出相对剥夺感。正如社区工作人员所说，“这边来自全省多个区域，最早居住的快 20 年了，最近住进来的就 3 个月，居民之间经济和生活水平差异很大，他们彼此之间难免会去做比较，平时工作开展也很难”。除此之外，搬迁居民缺乏一技之长对未来生活规划表现出无奈和焦虑，对政府部门有关社区规划和福利保障政策的预期与实际不满意表现出情感倦怠，对社区的认同感、满意感和归属感较低。如居民和社区工作者所说，“也是没有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吧，不行了我就继续回家盖个小房子继续种地”（A 居民）；“因为住宅规划和拆迁补偿居民闹过很多矛盾，但规划是提前设计，没法改变，补偿问题由安置工作小组统一处置，社区暂时就只能去调解，也做不了实质性工作”（S 社区工作人员）。

（三）空间生产的结构困境：空间区隔瓦解集体共识和协同参与的治理秩序

空间区隔是空间治理的结构障碍。空间解构既催生新的社会隔离与社会歧视，使得安置居民在社区参与中逐渐边缘化，又催生新的社区组织秩序与主体权力结构，致使社区治理体系碎片化，瓦解了社区固有的治理秩序和治理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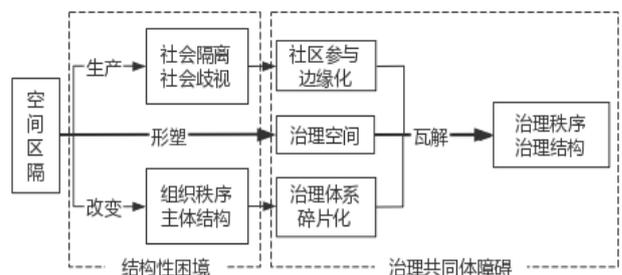


图 3 空间区隔的生产及作用机制逻辑

1. 社区参与边缘化：空间区隔催生新的社会隔离与社会歧视

空间分异催生着社区空间解构，致使社区在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区隔化，各种相互排斥的“双城”“碎城”和“多极城市”的空间形

态逐步形成^[26]。空间分异既是在居住空间上的隔断,又是在居住条件(为居住提供的基础收益)、共享资源(社区内部的公共服务)和附加利益(社区所能带来的荣誉、自豪感和社会网络等无形收益)等空间利益获取上的割裂^[35]。居住隔离是空间解构和空间区隔最直观的表征,内隐的是群体、话语、人际和心理隔离等社会隔离的再生产。安置区在物理空间上被规划隔离,既是安置居民与原生居民由于多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原因导致的环境、资源、住房、教育、财富、身份等差异表现出的“外隔离”,又是安置居民内部不同群体间由于民族、文化、语言、惯习等不同出现的“内隔离”。内外隔离使得不同居民被贴上特有标签,即传统街区和商品房小区的相对“富庶区”与搬迁安置区、廉租房小区的相对“贫穷区(民族区、地域区)”,这种空间层面的特定标签凸显的是安置区居民的资源和机会获得障碍,导致其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个人身心健康等因素的多维度叠加逐渐边缘化,并物化为存在结构性障碍的社区空间^[36]。正如社区居民所说,“人家(原生居民)在跳广场舞,我们只能在旁边看,说东西是他们的,买东西还得跑到那边去,他们平时除扔垃圾会来我们这边,其他时间几乎就没见过”(F居民);“虽然人家当面也不说我们咋了,但平时进出门也能感觉到他们意见挺大,上次碰到一个人,她很恼火地看了我一眼说啥人都有”(A居民);“我孙女上幼儿园社区一直不同意,说户口没转过来,平时买药也不能用农村的合作医疗,社区楼上有个棋牌室,没事干去转转,他们一直都占着,走的时候门也锁上”(G居民)。因此,“内外隔离”的双重分异使得安置区居民既无法享受社区内的资源和机会,又无法与安置区内其他群体实现有效融合,进而表现出“内外”双重融入障碍及社会歧视困境,逐步导致其社会参与边缘化,造成安置区居民在生活、生产、参与、交流和互助等方面表现出结构性困境,社区集体共识因情感依赖、身份归属和共识价值基础弱化而难以生产,瓦解着社区内生的治理动力和治理秩序,制约当代社区共同体的构建,不利于安置区居民的生计可持续发展及当代基层社区治理。

2. 治理体系碎片化:空间区隔瓦解固有组织秩序与主体结构

传统乡村及城市社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固有的治理模式,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空间解构和

区隔化实质上打破了这种相对稳定的治理结构,并以此生产着新的治理空间。社区空间形塑着辖区内公共价值及居民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和心理特征^[37],影响着社区的治理基础、治理需求和治理体系等结构的转变。传统社会是建立在自然情感基础上的地域性村落与伦理共同体的结合,居民基于地缘、血缘及共同劳作建立了持续性的信任、依赖、归属和共识的价值认同,并以此生产出符合传统社会治理的基础秩序(规则秩序和礼俗文化)和居民行动方式(治理行为和策略),形成了固有的治理秩序、体系制度和治理方式,这是长期以来传统社会保持稳定性的内在机理^[38]。而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空间解构和区隔形塑着新的治理空间。其一,传统社会赖以维系长久稳定的情感共鸣和礼俗规训等基础秩序随着空间解构而破碎,固有的居民互助和自助意识瓦解,产生了“弱参与、难参与、不参与”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选择,制约着社区民主参与的治理实践,如工作人员表示,“别说治理了,能不能组织起来都很难说,居民不认识,让他们一块做什么根本叫不动”(S社区工作人员)。其二,空间解构推动原生居民和搬迁居民在空间场域的机械组合,异质性的人口结构衍生的问题成为社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如工作人员表示,“现在社区主要问题就是村民的管理,如何解决他们的生计,如何把整个社区给盘起来,社会组织、物业等服务有限, these 问题是当前最主要处理的”(S社区工作人员)。其三,空间解构使得多元主体因资源获取和社区参与之间的不公而引发的权力不对等,物业服务缺位与安置居民需求的不匹配,社区居委与村委双重管理引发的秩序混乱等,形塑着新的社区权力主体结构和治理体系。如工作人员表示,“从社区整体来看,所有居民在资源分配上都是公平的,但也和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有关,我们只能做到全部兼顾,但是具体的一些政策、资金和服务获取上还是有区别的”(S社区工作人员);“在这里主要是不知道我们到底归谁管,现在户籍还没变,很多业务社区推给我们村,我们村又说去找社区,而且这个物业的服务也不知道做了啥,只管收费,家里水管漏水好久都不来,找他们还推来推去”(I居民)。原有的乡村治理空间解构生产新的组织秩序和主体结构,瓦解了固有的治理基础和体系。良性社区治理是社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领域,易地安置社区的良性治理空间亟待再生产。

四、空间赋能：易地安置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运用空间赋能，依据结构-关系-实践-发展的多重赋能逻辑，挖掘、整合和激活社区空间中的潜在动力，赋予空间生产基础上的物理、社会和精神空间以内在能量，化解易地安置社区共同体障碍并助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

（一）空间结构赋能：通过居住嵌入与文化嵌入优化社会结构

社区空间结构赋能是以一定的组织规则，将人口、组织、文化、设施和景观等社区形态链接整合成统一的社会系统。理想社区结构是一种和谐稳定的状态，是包括物理、社会和精神空间在内的生产和谐、安定有序、充满人文关怀和情感寄托的整体而非充满不公、斗争和冲突的灾区^[30]。空间结构赋能的核心在于促进社区结构的协调一致和功能耦合，营造温馨的环境氛围，塑造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首先，完善城市规划实现居住嵌入。要在物理空间打破传统的空间分异状态，在原居民场所开发和改造安置区，适当降低安置区物业费，实现原居民和安置居民的空间居住互嵌，同时，要统筹社区建设布局，优化社区公共设施和交通，营造友好的社区居住环境，缓解空间拥挤和不适，让社区内所有居民在空间上交错杂居和共享社区资源。其次，修缮多样性的文化载体设施。借助承载集体记忆和意识的各个群体、民族仪式文化来传承群体认同和促进文化交流，推进社区多元一体文化共建，超越根植于标签化、偏见和基于对个体和群体文化有限认识的概念，以多元文化作为社区营造的纽带，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古尔邦节、沐浴节、马奶节等为契机，组织社区文化交流，拓展社区文化内涵，促进社区文化融合，建立文化共生意识下的多元文化互嵌。

（二）空间关系赋能：通过文化记忆与集体认同重拾情感归属

空间中蕴含多元主体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空间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27]，社会关系包括制度、组织和私人关系，作为重要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是促进社会融合、参与、信任和认同的纽带，是实现社区良性治理的重要维度。关系赋能的核心在于挖掘社区潜在的关系资源和动力，赋予社区良性交往的新能量。首先，由“个别扶持”到“多元

关照”，保障多元群体权益，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处理好多元群体的权益保障和公民责任的关系问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以解决各群体、民族的共性问题为抓手，完善社区医疗、卫生、就业、教育、服务和文化等领域的政策，促进各群体、各民族平等享受社区的资源、设施和福利，消除社区的空间区隔和排斥。其次，由“搭建关系”到“放大关系”，破解关系界限，增进群体归属，处理好文化多样性与国家核心价值的一致性问题，以国家核心价值观培育为基础，尊重社区文化多元性，搭建各群体、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墙，吸纳居民领袖和志愿者开展国家核心价值和多元文化宣讲，促进居民的多维认同，帮助居民在参与、交流中实现自我价值和促进和谐社区关系的发展。最后，由“物质服务”到“情感服务”，打破公共服务壁垒，转变服务方式，挖掘各类居民的群体记忆，以物质服务和情感服务手段，积极组织各类群体和民族的多元文化活动，挖掘社区各群体、民族的群体记忆并融入社区集体记忆之中，促进多元群体的沟通交流和文化认同，并在交流与认同中提升个体和社区价值，改善彼此关系，增进社区归属。

（三）空间实践赋能：通过共同参与与共同治理寻求角色认同

空间实践指人们在空间中的行为活动，是塑造日常生活空间的重要元素。社会生活是特定群体在特定空间中的实践反映，空间实践可以理解为具有特定身份的使用者对空间的介入、占据或创造，强调空间使用者的身份属性、空间利用方式及权利和义务的关系^[39]，空间实践赋能的核心是提升居民在社区的主体性地位，共同享有社区资源和设施，建构良好的社会关系，促进社区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和协商意识，形成良好的协同治理基础。首先，在空间结构和关系赋能基础上，持续完善社区实践载体，破解公共实践壁垒。搭建涵盖“文、娱、教、养、医、食、体、行”的综合性空间设施，推进双语幼儿园、民汉合校，为居民打造多元一体的休闲文化和生活实践场域，完善多元的空间利用方式。其次，激发社区活力，引导多元参与。瞄准基层治理困境，理清社区多元资源，发挥党的引领作用，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专业力量，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资源为补充，培育和孵化社区自组织，发掘社区骨干领袖，链接社区各类资源，开发社区公益项目，鼓励和引导社区自组

组织和各类群积极承接项目参与社区共建,逐步打造社区多元联动和协同治理格局。最后,搭建协商议事平台,营造共同参与氛围。聚焦居民的“身边事和矛盾事”,开展社区协商议事,在协商探讨和达成共识后筹备民主议事会,建立长效的社区协商议事机制,根据社区实际逐步丰富党组织生活会、楼长议事会、物业管理议事会、居民议事会、社区安全应急会、民族文化交流会、地域文化分享会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协商议事类型,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线上+线下”的议事形式,拓宽居民的社区参与途径,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精神,提升社区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推动基层社区治理创新。

(四) 空间发展赋能:通过共同创造与共同发展迈向共同富裕

空间发展赋能的核心在于促进社区的整体性和可持续发展,它既是社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综合发展,又是社区居民在收入、教育、知识层面的共同提升。空间的整体性和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基层社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重点在于解决好社区弱势群体的生计保障、多元居民的社区融合、公益慈善资源的共同使用、社区产业的多元一体发展和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

首先,稳居救困、重建生计,缩小社区内部差异。完善安置区搬迁农户的生产和资源补给方式,支持社区周边空间闲置土地的开发和利用,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保障安置区居民基本生产生活;为安置居民开拓就业岗位,提高特殊群体的福利保障;依靠本地龙头企业,扶持本地小微企业发展,鼓励企业吸纳移民就业,持续缩小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其次,持续赋能、整合资源,发挥政府和社会力量在三次分配中的运用。政府应扶持本地企业发展,落实企业慈善捐赠政策,社区积极与社会和企业对接培育慈善组织,促进社区慈善资本增加,发展社区公益事业;整合社区资源,发挥群体优势与潜能,生产特色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建立邻里集市,鼓励社区零售发展,推进社区产业多元发展;探索社区就业培训模式,为安置居民提供择业咨询、技能培训和职业安置,完善生计方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最后,共同参与、共享成果,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党组织为引领,联合社区两委和物业,培育社区自组织,引导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开展环境整治、文化营造、设施维护、安全巡护和纠纷调解,

挖掘促进民族团结、参与社区治理、营造社区文化的集体和个人并予以表彰,发挥典型示范效应,提升居民主体认同和参与意识,增进社区集体归属感,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G省S社区的分析表明:易地扶贫安置社区空间变迁主要表现在空间分异推动空间解构与空间区隔的再生产,亟待围绕空间变迁运用空间赋能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形成。空间解构体现了易地搬迁后传统空间结构的解体和新型空间结构的生产过程,既体现在物理空间的转移,又是社会空间关系和结构等的解体,由此导致乡村稳定的传统共同体形态瓦解;空间区隔反映了伴随空间解构而衍生出新的社会平等、社会正义、社会治理问题,制约着新的社区共同体形态的生产,造成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共同体建构障碍;应借助空间赋能重构良性的社区空间结构,通过“结构-关系-实践-发展”四个维度赋能,激活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内在能量,重构当代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社区共同体,提升易地扶贫安置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非常态属性”的易地安置社区是基层治理的重要领域,若借助常态社区的治理模式、经验及思维易于引发更多的治理困境,特别是面对多元群体社会空间依存的异质性、物理空间载体的有限性、公共文化参与的排他性等会引发一系列社区治理障碍。本研究通过空间赋能的实践框架,挖掘、整合和激活居民空间场域中的潜在动力,赋予空间流变基础上的物理、社会和精神空间的内在能量优势,对化解易地安置社区共同体障碍并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逐步发展为新型的生产要素,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的实践及模式为易地搬迁安置社区良性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治理模式的发展和成熟,数字空间也必将成为易地安置社区的新型空间分析维度,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易地安置社区数字空间,将有助于易地安置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

参考文献:

- [1] 辛丽平. 贵州民族地区扶贫移民中的社会适应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3): 55-59.

- [2] 任新民, 马喜梅. 现代化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稳定脱贫实证研究——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石漠化片区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7(4): 103-111.
- [3] 丁波. 新主体陌生人社区: 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重构[J]. 广西民族研究, 2020(1): 56-62.
- [4] 卢爱国. 制度重塑生活: 民族地区扶贫移民融入城市社区的制度分析[J]. 湖湘论坛, 2022, 35(1): 32-41.
- [5] 久毛措, 余文超. 元治理视角下拉萨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考[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2(3): 94-101.
- [6] 安治民, 李文钢, 孙娟.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重建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22, 43(4): 76-81.
- [7] 万泳延, 王贵琴.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可持续发展研究[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20, 21(2): 125-129.
- [8] 周强, 黄臻, 张玮.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民族地区扶贫搬迁农户后续生计问题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 41(7): 21-27.
- [9] 李文钢.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内部碎片化的表现形式与原因分析——以贵州 F 社区为例[J]. 求实, 2022(4): 69-81.
- [10] 郑娜娜, 许佳君.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以陕南 G 社区为例[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1): 87-95.
- [11] 郑娜娜, 许佳君.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融入——基于陕西省西乡县的田野考察[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58-68.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14] 韩小敬. 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探析: 重读《共产党宣言》[J]. 贵阳市委党校学报, 2016(5): 1-5.
- [15] 张一兵. 社会空间的关系性与历史性——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10): 24-30
- [16] PIERRE BOURDIEU.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Spac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627-638.
- [17] 董苾茜. 社会区隔与贫困的再生产[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18] 吴启焰. 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领域及其进展[J]. 城市规划汇刊, 1999(3): 23-26.
- [19] 王琪. 转型、空间与区隔——社会转型期城市居住空间演进逻辑的实证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15(8): 71-78.
- [20] 林聚任, 申丛丛. 后现代理论与社会空间理论的耦合和创新[J]. 社会学评论, 2019, 7(5): 15-24.
- [21] 王晴锋. 从列斐伏尔到苏贾: 社会科学空间理论的发展[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 4(2): 1-4.
- [22] 黄怡. 城市居住隔离的模式——兼析上海居住隔离的现状[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2): 31-37.
- [23] 黄怡. 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6.
- [24] 菅志翔. 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 [25] 王艺璇. 空间资本差异视角下的城市居住秩序和空间区隔——基于两类社区的比较研究[J]. 城市问题, 2020(3): 13-19.
- [26] 顾朝林, 刘佳燕. 城市社会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1196-1205.
- [27] LEFEBVRE H.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M]. New York: Irving, 1979.
- [28] 郑震. 空间: 一个社会学的概念[J]. 社会学研究, 2010, 25(5): 167-191.
- [29] 陈默. 空间与西藏农村社会变迁: 一个藏族村落的人类学考察[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3.
- [30] 贺霞旭. 结构类型与街邻关系: 城市社区整合的空间视角[J]. 社会, 2019(2): 85-106.
- [31] 芮必峰, 陈燕. 你我交往使社会成为可能——齐美尔人际传播思想札记[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11): 140-143.
- [32] 方英. 文学叙事中的空间[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6, 29(4): 42-48.
- [33] 罗伯特·E·帕克. 城市: 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M]. 杭苏红,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34] 胡平, 韩宜霖. 心理空间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初探[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 41(6): 150-154.
- [35] 冯云廷. 居住隔离、邻里选择与城市社区空间秩序重构[J]. 浙江社会科学, 2018(9): 70-76.
- [36] 韩勇, 贺萌琳, 高军波, 等. 空间隔离视角下中西方城市社会排斥研究述评[J]. 人文地理, 2020, 35(6): 26-34.
- [37] 张勇, 何艳玲. 论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面向[J]. 新视野, 2017(4): 84-91.
- [38] 杨慧, 吕哲臻. 个体化视域下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重塑[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2(2): 89-98.
- [39] 王权坤, 胡雪瑶, 艾少伟. 身份、流动与权力: 街头摊贩的空间实践[J]. 人文地理, 2020, 35(6): 35-43.

责任编辑: 曾凡盛